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87-2415-h-002-042

執行期限：86 年 8 月 1 日至 87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華昌宜 email: hua@ccms.ntu.edu.tw

博士班獎助：李君如 email: d1510003@ccms.ntu.edu.tw

執行機構及單位：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經濟改革開放後上海區域的空間發展與相關體制變遷之研究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Region Since 1978

一、中英文摘要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開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引起的社會、文化與環境的影響是多層面且深入的。我們所感興趣的是地方之空間發展如何因應演變？而影響空間發展的機制又如何？故本研究擬藉由對上海城市發展過程中相關體制變遷的歷時性分析，探討於社會主義背景下之意識型態、制度、空間實踐等三者在不同時空脈絡下的關係，尤其是對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看待方式的轉變是在何種情境下、如何被塑造出來，並進一步影響到區域的空間發展。另一方面則藉由觀察改革開放後為因應經濟發展的需求而調整的政府職能與權責劃分的轉變，瞭解在不同階段制度的變遷受到哪些環境因素的影響；討論國家如何透過對立法、財政、規劃等制度的放權、收權以形塑政策執行的制度環境，以及在不同環境下政策如何落實到地方。換言之，本研究即在探討上海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劃體制下，近年來的區域空間發展與土地使用之規劃管理、地方財政、企業改革及行政體制的關係。

然後以上海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就改革開放後北京的空間發展與相關體制的變遷做現象觀察與城市空間發展背後機制的探討，希望從不同城市的發展脈絡中進一步檢視及修正以往的研究(第二年計畫)。選擇北京的意義在於其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以其為研究社會主義國家相關理論與實踐的主體，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關鍵詞：大陸、上海、城鄉發展、城市規劃、土地使用、行政體制

Abstract

Since China started its economic reforms in 1978, a great impact has been effectuated on the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We are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how the local spatial development has responded to such changes, and what are the mechanisms that have influenced such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such interests, we used recent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of Shanghai as an example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deology, the administrations system, and the spatial implementation in a socialist society. We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attitudes toward the ownership and the use of land are shaped, and, then, influence the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investigated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of the local administrative apparatus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n organization and its environment,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hange of the organization under different phases of developmen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production of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we examine

how the state enacts regulations, and implements different policies in regions of various backgrounds. In other words, this research undertaking study how Shanghai city manages its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the use of land in a socialist society,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enterprise reforms, local planning regulations.

Then on the basis of findings from Shanghai, we will further study Beijing within the same framework, hoping that we can better and modify previous results.

Keywords: landuse, regional planning, Shanghai, Socialist city, spatial structure, urban planning

二、計畫緣由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中國大陸自 1978 年開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城鎮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異常快速，因而引起的社會、文化與建成環境的影響是多層面而且深入的。這種變化的速度與規模也很可能超過台灣四十餘年來號稱世界奇蹟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變化。面對這樣舉世少見的變局，研究者亟欲探究的問題是多重的。而延續與累積以往申請者對城市規劃與土地使用的研究經驗，我們所感興趣的是都市之空間及社會形構，在此經濟變化過程中的相應演變究竟如何？演變背後的機制又如何？選擇上海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為：上海過去代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實現，與中共的「治國」理念，存在共生關係，改造上海對中共的政經體制而言即意謂著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加上不論從經濟實力、產業發展、建設開發速度、制度調整等層面來看上海與中央的關係，上海本身市/區/縣的關係均具有相當的代表性與獨特性，應是空間發展研究的重要對象。換言之，本研究即在探討：在社會主義的中央集權式規劃體制下，中國大陸的第一大都市—上海近年來的土地使用之規劃管理、地方財政、企業

改革及行政體制等，如何因應此經濟改革的變動而影響到城市空間的發展。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上海(北京)兩地區在 1978 年經改後的空間結構較之經改前(或原社會主義制度的空間)究竟產生了何等變化；又如此的轉換機制是否源自市場力量、國家經濟政策、地方政府的職權與規劃？尤其地方政府對於地區開發的積極性究係來自何處？各級地方政府(市/區/縣)的行政組織與所轄的事業單位如何因應此市場化趨勢？如何達成區域空間的競合與行政機制重組？透過對上海(北京)地區不同案例開發過程的探討，進一步釐清市/區/縣/鎮政府在空間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與功能；探討土地開發及再開發的模式，分析制度變遷及政策工具(如土地批租、有償轉讓、置換、動遷等)的執行與應用。

三、結果與討論

上海作為中國特大型經濟中心的城市，在實現國家宏觀調控下的資源配置優惠上具有獨特的地位和作用，尤其國家的區域經濟政策更賦予其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帶動整個長江流域經濟發展的任務，使上海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為突出。於是在以發展為目的、企圖將上海推向國際大城市之舞台的同時，我們看到一棟又一棟高起的新建築，整個城市被世界知名建築師的作品充斥與填塞，甚而有人說 90 年代的上海是建築師的最佳實驗室，也是開發商的寶地。然而，透過制度變遷及地方政府政策執行的作用，我們發現改革的實際進程並非完全遵循著最初動機的指向。舊體制與舊結構本身的危機所造成的實際壓力一方面迫使改革向市場化的新體制推進；另一方面，體制轉軌卻也使得社會出現種種的異化現象。面對急劇地空間地景變遷，我們難以在「毀滅性的創造」與「創造性的毀滅」的價值觀中取得一個平衡點。然而，卻可以截然指出，城市空間不斷地改造與重整，其背後的動力主要即來自於地方政

府出於尋利與尋租動機下的積極作為，而使其在改革開放後的上海空間發展中扮演攸關重要的角色。

綜合前文的探討與分析，本研究歸結出影響現階段中國大陸空間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從宏觀環境的政經氛圍及制度變遷的作用兩個層面分別探討。

(一)政經氛圍的演變

檢視中國大陸的政經體制演變過程，進而對應不同時期的制度與政策執行，我們可以說，政經體制的深刻變化是影響空間變遷的重要結構因素。改革以前，許多人慣用以集權(或極權)主義模式作為論述中共國家機器和社會的關係。高度集權的特點表現：1.中央政府及其組織承擔了整個社會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教育、從意識型態到生老病死等各個領域、各個環節的全面管理的職能；2.為實施這些職能而建立起了龐大的行政管理系統，從中央以致鄉鎮、層層疊疊、嚴密穩固；3.這一管理體系自上而下具有相應的集權結構，而缺乏制衡結構(周雪光, 1992)。而在中央控制式的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地方政府的功能僅止於監督和執行中央交付的計劃任務，換言之，各級部門和地方單位是一連串的承上啟下的行政鍊條，服從上級的領導指揮是這種建制的結構性必要要求。這樣的看法，類似於古典執行理論中「上令下行」的方式；然而，實際上，隨著各地執行者的水準、道德品質以及各地區的發展差異性，地方對中央政策賦予不同的理解、解釋，從而採取「彈性」的執行方式，是不可避免的。

地方政府這樣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處理方式，過渡到「市場經濟」時，加上改革開放以「權力下放」為核心的相關政策制度的調整¹，使得地方政府的「活

力」更勝於以往。此時期的政策執行，我們可以說已經跳脫了「計劃控制模式」或是「互動模式」所可以解釋的範圍，而進入一個「演化與調適」的過程²。

我們進一步來看 1978 年中共的再度下放權力，此舉是如何使得地方主義在經濟層面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力？鄭永年(1994:48)將鄧小平的改革策略稱之為“建設性地方主義”。它是通過“利益代表”來尋求改革動力的一種機制。一種制度化的模式，中央政府通過談判，顯現地或隱現的與其屬下國家組織達成協議。談判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乃是獲得利益或制度化利益的下屬組織或個人保證他們的行為大致代表中央政府。相對於毛澤東用的群眾動員戰略，鄧小平則是採取市場取向的發展模式。與毛的高壓政策不同，鄧使用的是物質刺激的方式來激發地方積極性。亦是讓地方官員從地方發展中獲得好處。財政改革因此成為必然。

在傳統的指令性計畫體制中，行政管理部門對企業既擁有行政管理職能又具有產權管理職能。而後一種職能，主要是通過主管部門與企業之間的「行政隸屬關係」而被融入前一種職能之中；在改革之中，中國大陸的經濟權運轉，基本上主要是中央和地方之間在企業的行政隸屬下收放反覆；而 80 年代的「分灶吃飯」財政體制，使得各級部門對其行政區域內的企業，因為獲得來自中央的行政性和經濟性分權，從而等於也擁有資產所有權，亦即隨著中央下放的行政權和經濟權，形成了部門和地方所有制的局面，於是形成了眾多的權力和利益主體，它們各自追求符合本位主義需要的局部權力和利益；這一方面導致中央調控能力的削弱和宏觀經濟面的紊亂；另一方面則會導致統一市場的無法形

主權限大為提高。

¹例如 1980 年以後，中共開始實施地方包幹式的財政「分灶吃飯」制，在上繳一定額度後，地方可保留若干稅收；並賦予地方政府若干權限，可以在某個範圍內自行決定投資項目、外資及自由配置資源使用之權限。或是在農村實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則徹底瓦解了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加上鄉鎮企業的興起，亦使得地方相對於中央政府的自

² Majone & Wildavsky 他們認為執行即是進化。執行過程發生在我們未曾創設的世界中，而我們剛好在一些事情先後發生的過程中；不論我們正在執行何種政策，在每個點都必須能掌控新的情況以使得我們實現不同潛能。當我們履行一個政策，我們即改變了這個政策。(Majone & Wildavsky, 1978)

成。

是以，依目前的情勢看來，1978年後的「放權讓利」所造成的「弱中央強地方」的局面，似乎有可能終結過去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因為「放」固然仍是「亂」，想「管」卻沒有以前那麼容易了。在空間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種種中央與地方競合的張力作用，現象的本質已顯然反映地方政府的角色已逐漸超越中央；「上令下行」由地方來自詮釋如何「執行」，「下情上達」卻是中央不得不面對或處於被動因應的無奈。

(二)制度變遷的作用

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地方政府同時兼有計劃調控與經濟利益的雙重主體身份。此次改革強調經濟發展的基本背景，使得權力下放的作為不可避免地對地方政府產生巨大的利益效應。尤其在財政制度改革下，所謂「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真正發生了效果，促使經濟迅速成長。但卻也造成地方政府的本位主義，原有的計劃調控角色的功能逐漸式微，而以地方本位出發的經濟利益主體角色愈發明顯。我們進一步審視與空間發展密切關連的土地使用制度與城市規劃制度在此轉軌中的角色與作用。

1.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對空間發展的深層影響其實不在制度本身，而在於制度背後所反映出的意識型態的轉化過程，即是對於土地價值認知的改變。過去在強調「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情況下，土地的「三無」（無償、無流通、無限期）特性實際上是造成了無計劃、無效率、無秩序的土地使用；改革方將土地的價值激化出來，重新轉化了空間發展的內涵與速度。我們要特別指出的是「漸進式改革」所造成的「雙軌制」是現階段空間作用的主要影響因素。依1996年的資料，全中國出讓的土地中，依出讓面積計算，仍有67.36%為行政劃撥的比例，上海則高達88.68%（97'中國統計年

鑑：7）。而行政劃撥如同改革前計劃體制時期，仍不免成為「單位所有」、「部門所有」；繼而使得擁有土地的管用機關得以用「土地」作為籌碼來交換單位或個體利益，此種尋租行為隨著土地商品化的發展而愈演愈烈；進而對真實的土地市場形成衝擊。再就協議居出讓方式高比例的情況來看，「條件式的交換」使得交易的價格受到扭曲，此舉使得「地方」利益最大、「投資者」成本最小，相對付出代價的則是國家或是社會全體。此外，關於土地使用的稅費、特區的優惠政策等等，這些均是地方與投資者「談判」的政策工具，「談判」並不在於取得雙方利益的「均衡點」，而是在取得雙方利益的「極大點」，以規避要上繳中央的部分達到「創租」。

再就「批租」來看，理論上，國家掌握有土地一級市場的最高權力。此種方式的原意在使城市的發展能在計劃調控下循序有效的進行。然而，實際的狀況是，政府的政策總是追著「市場」的變化跑，92-93年過渡批租高檔房（花園別墅、商業辦公樓），造成市場供給過剩後，方停止批租某類型的用地。等到發現市場上有大量空置的商品房，而居民卻仍有龐大的住房需求；才制定政策鼓勵外資內銷房或外資平價房的建設。政策的制定雖然反映了政府作為地方計劃管理者的角色，因應問題而謀求解決；但此點有別於一般認為市場失靈時政府應介入的觀點。因為，政府一開始即藉由土地出讓介入了土地市場，而「市場失靈」更有相當程度的原因是體制的結構性缺陷，例如企業的軟預算制造成的盲目投資行為；再例如現有的政治結構下，有一系列的政府部門直接和間接地參與城市土地管理，然而卻缺乏協調和配合。再者，政府最初的介入應有一個宏觀的、長期的計劃作基礎；然而，從空間實踐的過程，我們卻看到了計劃或規劃的軟弱無力，那麼，究竟又是何種原因，造成了此種現象？

2. 上海市城市規劃的執行與作用

隨著城市規劃法的制定，城市規劃邁

入法制建設的階段。我們要指出的是，城市規劃性格的轉變，並不意謂著其在空間發展中的功能因此而「增強」，從前的為計劃服務，現在的為開發服務，在市場及資本力量的衝擊之下，規劃其實是很「無能」的。但是中國的「規劃許可制」又賦予了規劃官僚相當大的裁量權，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屬於城市的整體利益或是社會利益的部份，往往為了換取局部或短期的經濟發展而被犧牲掉了。制度本身或許有所不足，但真正的關鍵是在於官僚如何「用活、用足」政策。產生的有趣弔詭現象為，上級政府不滿下級政府制定的規劃而未予以通過（例如中央對上海、上海的市對區/縣），這樣反而給予地方「彈性操控」的空間；造成既成事實之後，已僅非「規劃的滯後」所能解決的現實。

3. 地方政府的制度性尋租

由於地方政府具有被中央授與詮釋和執行中央政策的角色，使其獲有一定程度的「壟斷性權力」。改革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種種利用機會搜尋預算外收入的種種尋租行為。這裡要指出的是，在國家與社會均被「發展」價值觀所穿透的氛圍下，地方政府、部門、或單位、幹部的尋租權力，其實有一部份是國家為了鼓舞他們的改革意願而有意製造出來、或是故意「視而不見」的(造成變相鼓勵)。將此稱為「制度性尋租」的意涵在於，其是依附局部改革的制度背景而生，有別於一般個別腐敗或貪污的現象；更重要的是，此種行為反映了在改革的過程中，國家與地方之間既相互利用、又激烈競奪利益的矛盾關係。

4. 結論

在此情勢與發展軌跡下，我們認為中國大陸的城市發展，「地方」將扮演愈形重要的角色，如何以地方價值為基礎來動員地方資源與吸引外資，成為地方政府的首要課題。本研究透過對地方政府作為管理者角色的分析，顯示其對地方發展的控制主要透過：1.土地審批、2.規劃管理、3.

財政收支及計劃管理。改革的原意本在於轉變計劃體制時期由政府完全主導土地開發的過程，而朝向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旨在創造良好的地方投資開發環境並規範不法的行為，而由投資者在市場中自由競爭以取得最大效益。上海在此雙軌制的過渡過程中，因改革而下放的權力伴隨著政企分離的企業改革，使得政府的角色變得非常的曖昧；在傳統「社會主義公有制」下的土地使用權逐漸被釋放出來時，政府無疑地雖仍在土地配置與使用的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關鍵角色，但政府職能與企圖已截然不同於改革前，而同時夾雜著行政控制與市場尋租的雙元性格；在土地開發過程中，以多樣的形式呈現(是計劃者、管理者、也是投資者)。換言之，地方政府作為以追求最大經濟利益取向的經濟主體的角色愈發明顯；由於產權關係的作用，地方政府獲得了更多的政策和非政策手段來引導和干預地方經濟，而市場化的背景使得這種干預具有積極作用，從而使地方政府能夠扮演一種「發展型政府」的角色。上海在「二級政府二級管理」制度下，地方政府(區/縣)比市政府在推動地區開發與再開發時更為積極與重要。另一方面，在傳統「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所造成的「政企合一」特質，使得企事業單位因為擁有土地使用權而得以利用土地進行投資開發。正是因為此種角色的多元性及角色間的「曖昧」關係，加上由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的轉軌背景，使得現階段體制出現龐大的「灰色地帶」，灰色的土地市場、灰色的收入、灰色的職業(第二職業)等等，而上海的空間發展，就在此氛圍中，在地方政府「尋利」與「尋租」的驅動下，不斷進行演化與調適的重構過程。換言之，吾人所看到在房地產開發過程中所呈現出土地批租的亂象與城市規劃的變異，即是地方首長的發展主義心態及土地資源管理或使用者(地方政府、企業、學校等部門或單位)的尋租行為的具體反映，對城市建設與地方經濟成長同時兼具阻力與助力的雙重功能。

(三) 後續研究方向

透過上述層層探討，我們指出上海城市空間不斷地被改造、重塑，其背後的動力除了特有的歷史、區位與政策所帶動的國內、外投資意願之外，主要是地方政府出於尋租動機的積極作為，亦即，地方政府在成為經濟利益主體後，隨之而來的經濟利益與地方財政需求的必然連結，尤其是作為土地使用權的最初擁有人及土地價值實踐的管理者，使其同時也成為龐大土地租隙產生的媒介。我們認為在這樣的基礎上，未來可繼續發展的方向有：1.由計劃體制到市場化過程產生的土地龐大租隙，是使得中國大陸現階段的尋租行為未如其他開發中國家造成經濟負成長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若以一個長期的觀點來看，租隙的產生及消失將與經濟發展形成一種複雜的關連，其未來的互動模式為何？不僅為吾人所關切，更為中國經濟成長的制約性因素，更深入的探討將有助於地方政府在地方發展過程中角色調整與政策制定的參考。2.藉由不同城市發展與觀察的比較，可以更具體的指陳出在空間發展的過程中，何者是上海獨有的特性，何者是轉軌期的中國城市共同之「運作邏輯」。3.目前的中國仍是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政府的功能與角色也正置於不斷的變化與調整當中，其行為模式一方面對地區發展形成衝擊，一方面又為因應地方發展而改變；持續地觀察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互動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建構不可或缺的一環。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成果呈現了一種獨特風格，既未遵循某一學門的研究方法，也不屬傳統的都市分析或都市計畫研究，而因其涉及政治、經濟、社會、與都市發展各種層面，使得其田野調查報告內容極其豐富，超過了原申請時之目標。但亦正由於其複雜性，使得雖然大致在原計畫架構下完成執行，但撰寫後之成果缺少了一些明確一致的主題與論點。由於過份看中探索真相，其結果是在報導與全市之間落比，尚未能

歸納為一理論上的貢獻。

五、參考文獻

1.中文部份

- [1] 上海土地編輯部 (1993-1997)《上海土地》，上海：上海土地編輯部。
- [2] 上海市土地管理局 編 (1992-1995)《上海市土地管理文件匯編》，上海：上海市土地管理局。
- [3] 上海市計劃委員會、上海市統計局 編 (1992-1995)《九十年代上海投資環境》，上海：上海市現代科技印刷出版社。
- [4] 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 編 (1996)《上海市房地產管理文件匯編》，上海：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
- [5] 上海市房產管理局 編 (1992-1995)《上海市房產管理文件匯編》，上海：上海市房產管理局。
- [6] 上海市城市規劃管理局 (1992)《上海市城鄉規劃管理法規文件選編(上、下冊)》，上海：上海市城市規劃管理局。
- [7] 上海市城市規劃管理局 (1994)《上海市城市規劃管理技術規定，土地使用、建築管理部份》，上海：上海市城市規劃建築管理局。
- [8] 上海市統計局 編 (1997)《'97 上海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9] 上海市統計局 編 (1995)《'95 上海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10] 上海市統計局 (1992-1997)《上海市房地產市場》，上海：中國統計出版社。
- [11] 上海市松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編 (1994)《松江年鑑 1991-1993》，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12] 上海年鑑編委會 (1997)《上海年鑑 (199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3] 上海經濟年鑑編委會 (1983)《1949-1982 上海經濟年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 [14] 上海經濟年鑑編委會 (1987-1997)《上海經濟年鑑》，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
- [15] 上海農業委員會 (1994)《上海郊區年鑑 (1949-199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6] 上海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編 (1996)《南市區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7] 上海地方誌編纂委員會 編 (1994)《松江縣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8] 上海研究中心 (1991)《上海 700 年》，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 上海財政稅務誌編纂委員會 編 (1995) 《上海財政稅務誌》，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20] 中國社科院財貿經濟所、美國紐約公共管理研究所 (1994)《中國城市土地使用與管理 (總報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4。
- [21] 中國統計年鑑編委會 (1998) 《1997 中國統計年鑑》，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 [22]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 編 (1982) 《中國城市建設史》，北京：中國建築工藝出版社。
- [23] 同濟大學城市規劃系 (1996)《上海城市規劃實施情況調查論文》，上海：同濟大學。
- [24] 李君如 (1998) 《改革開放後上海地方政府在空間發展中的角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25] 吳良鏞 (1998) 世紀之交論中國城市規劃的發展 《城市規劃》，北京，1998(1):10-12。
- [26] 吳國光 (1994) 經濟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政府能力 《當代中國研究》，Princeton，1994(2):60-64。
- [27] 吳國光、王兆軍 (1994)《鄧小平之後的中國》，台北：世界書局。
- [28] 吳國光、鄭永年 (1995)《論中央-地方關係：中國制度轉型中的一個軸心問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29] 周雪光 (1992) 論「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李少民主編《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北市：桂冠圖書公司，頁 139-157。
- [30] 周雪光 (1994) 中央集權的代價 《當代中國研究》，Princeton，1994(2):54-59
- [31] 周偉林 (1997)《中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分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32] 胡鞍鋼 (1996) 正確認識和處理市場經濟轉型中中央與地方關係 《集權與分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構建》，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頁 72-79。
- [33] 洪啟東 (1998) 《轉化中的後社會主義城市區域：改革開放後上海區域的空間變遷》，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34] 樊綱 (1992) 漸進式改革與中國的現代化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香港社會科學服務中心，1992(1): p5-11。
- [35] 樊綱 (1996) 論公共收支的新規範—我國鄉鎮“非規範收入”若干個案的研究與思考 《集權與分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構建》，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頁 116-134。

2.英文部份

- [1] Buchanan, J.M. & Tollison, R.D. & Tullock, G. eds.,(1980) Toward a Theory of Rent-seeking Society.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 [2] Byrd, W.A. (1991)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 An East Gate Book .
- [3] Colander, D.C. (1984) 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 the Analysis of Rent-Seeking and DUP Activities. Cambridge, Mass. : Ballinger Pub. Co.
- [4] Forbes, D. and Thrift, N. (eds.). (1987) The Socialist Third World : Urban Development and Territorial Planning. New York : Basil Blackwell.
- [5] French, R.A. and Hamilton, F.E. (eds.). (1979) The Socialist City : Spatial Structure and Urban Policy.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 [6] Fung, K.K.(1987) “Surplus Seeking and Rent Seeking through Back-Door Deals in Mainland Chin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46). pp269-318.
- [7] Goggin, M.L., Bowman, A.M., (eds) (1990) Implemen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 [8] Lieberthal, K. (1992)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 In: Lieberthal, K. and Lampton, David M.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6-12.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9] Pressman, J.L and Wildavsky, A. (1984) Implementati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ird Edition.
- [10] Rowley, C.K. & Tollison, R.D. & Tullock, G. (198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nt-seeking. Boston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11] Tollison, R.D. and Congleton, R.D. (1995)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rent seeking.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 Brookfield, Vt. : E. Elgar.
- [12] United Nations (1989) China's Experi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apers no. 7) Bangkok, Thailand :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13] Wong, C. (1987). "Between Plan and Market: The Role of the Local Sector in Post-Mao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385-398.
- [14] World Bank (1993) China : Urban Land Management in an emerging Market Economy. Washington, D.C. : A World Bank Country Study.
- [15] Yeung, Y.M. (1993)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Recent Transformation Future Prospect.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6] Yeung, Y.M and Hu, X.W. (eds.). (1992) China's Coastal Cities: Catalysts for Modernization.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17] Yeung, Y.M. and Sung, Y.W. (eds.). (1996) Shanghai: Transformations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China's Open Polic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8] Zhao, X. and Zhang, L. (1995) "Urban Performance and the Control of Urban Size in China", Urban Studies. 32(4/5) : 813-845.
- [19] Zheng, Y.N. (1994) Quasi-Corporatism, Development Localism, and Behavioral Federalism,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 [20] Zho, D. (1990) Th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Urban Planning from 1980's to 1990's. Hong Kong: Centre for Hong Kong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21] Zukin, S. (1991) Landscapes of Power :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